

邓小平

中国军事改革的总设计师

穆显奎 侯鲁梁 著



DENG XIAOPING
ZHONG GUO JUN
SHI GAI GE DE
ZONG SHE JI SHI

黄河出版社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改革的前奏	(2)
第二节 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确立， 改革的全面展开	(10)
第三节 构建中国军事改革的总体框架	(16)
第四节 我国军事实践的理论指南	(40)
第五节 邓小平军事改革思想的理论特色 ...	(48)
第一章 把握国际军事斗争大势，确立新的国家、 军事战略	(54)
第一节 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全 球性的战略问题，重新确立了我国 军事战略的立足点	(54)
第二节 改变了长期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 的观点，得出了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 避免的重要结论	(58)
第三节 从国家长远的整体利益的需求上把 握军事战略，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 高准则来处理军事战略问题	(63)
第四节 坚持在军事战略上独立自主，不同 任何大国搞战略关系，不依附于任 何政治军事集团	(66)

第五节	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家统一问题的新途径,提出了筹划军事战略问题的新思路	(60)
第六节	着眼于建设强大国防和新时期军事斗争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诸军兵种建设与使用的新思想	(72)
第七节	创新我国反侵略战争指导理论,提出了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新思想 ...	(75)
第二章	建章立制,改革和完善国家军事制度	(83)
第一节	我国军事领导体制发展的历史回顾	(84)
第二节	适应新形势的变化,继承和发展“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102)
第三节	加强新时期军事法制建设	(118)
第四节	新时期军事教育制度的发展	(132)
第三章	着眼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特点,开拓建设强大军队的新途径	(139)
第一节	“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	(139)
第二节	“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 ...	(152)
第三节	“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163)
第四节	“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	(177)

第五节	“军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	(186)
第六节	“把整个后勤工作管好”	(203)
第七节	“宁肯少几个兵,少几个机关人员, 也要把学校办好”	(217)
第四章	从“四化”建设大局出发,调整军事建设 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222)
第一节	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	(223)
第二节	军队腾出力量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227)
第三节	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把军队建设和 国家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233)
第四节	军队要“忍耐”,调整军队建设的规模	(235)
第五章	适应新形势,用新的思路建设国防后 备力量	(242)
第一节	“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	(243)
第二节	“民兵就是要提到战略地位”	(254)
第三节	“把动员方案制订好”	(263)
第四节	“民兵应该成为生产的骨干”	(267)
第六章	把握当代军事力量发展的脉搏,推进 国防科技工业改革	(272)

第一节	世界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基本走势	
		(272)
第二节	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	(281)
第三节	新的历史时期,全力推进国防科技	
	工业改革	 (295)

绪 论

邓小平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军事改革的总设计师。

在革命战争时期，他长期担任重要战略方向的主要领导人，与刘伯承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部队纵横驰骋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舞台，用兵出奇制胜，治军雄才大略，以精湛高超的指挥艺术，以超常的智慧与胆识，为革命的胜利，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经验，科学地分析世界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及时调整了军事战略的指导思想，使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回答并着手解决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实现国防现代化，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摸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路子，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

1989年11月，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今后军队建设有着长远的指导作用。”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明确确定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是我军新时期建设的纲领和指南。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都在进行军事领域的改革。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同时也作为中国军事改革的总设计师，面对国际、国内军事斗争这个大舞台，进行了一场气势磅礴、举世瞩目的军事改革。

第一节 改革的前奏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夺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捍卫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这支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的问题，展开过多次复杂的斗争。

军队改革时的国内背景：

争夺军队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斗争，最为激烈地表现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性的灾难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严重的挫折和巨大的损失，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和证明的正确建军原则和方针被肆意歪曲否定；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创立的军事思想遭到篡改和诋毁；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践踏和破坏；一大批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军事领导人被无情地打倒、关押，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军

队刚刚起步进行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徘徊、停滞、甚至倒退。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英雄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性灾难中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的结果，并没有“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给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在这场长达10年的内乱中，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搞乱了，把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搞乱了。军队在这场浩劫中受到的冲击、遭受的破坏、造成的损失是触目惊心的。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把人民解放军作为他们争夺的重点目标。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首先插手军队，与林彪密谋策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揪斗和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林彪在军队中首先拿罗瑞卿开刀，诬以“篡军反党”的罪名将其打倒。他们诽谤朱德是“黑司令”、“大军阀”；他们捏造出骇人听闻的“二月兵变”事件，对贺龙进行了残酷的折磨，致使其含冤而死；他们攻击彭德怀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对他惨无人道地施以身体残害和政治迫害；他们胡说“外交部里有大鬼”，掀起“炮灯陈毅”的高潮；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也程度不同地受到诋毁、批判。“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二、乱世之际，“请了一个军师”

1971年“九·一三事件”震惊世界，同时也震醒了国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林彪反党乱军的罪行。1972年8月1日，国防部举行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一批遭林彪、江青迫害、关押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出现在招待会上。1973年3月，中共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1月，罗瑞卿被释放。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

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待十届二中全会召开时追认。毛泽东曾说过：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后来，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有关人员和部分军区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讲“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并对邓小平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在毛泽东的提议和支持下，邓小平重新回到了历史的舞台。

三、从整顿入手，改革在艰难中起步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又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四届人大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努力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召开了解决交通、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

1975年1月25日，刚刚任总参谋长职务不久的邓小平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军队建设存在的问题：“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

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我们军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山头，那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自然形成的。”“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①邓小平的讲话，坦露了他对军队现状的深切忧虑，同时，也表明他要改变军队这种现状，恢复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把军队建设搞上去的坚定信心。

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军委常委会，作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在军委常委会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批卓越将领重新走上最高军事领导岗位，这是军队建设的幸事，得到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也成为“四人帮”妄图篡军夺权最大的“障碍”。叶剑英、邓小平担负起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后，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在第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即被提上议事日程。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7月14日、15日，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整顿军队的任务。

会上，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分析，认为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页。

在增长。战争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是战争策源地的状况没有改变；战争不是三五年内一定打得起来，有可能推迟；有必要也有可能争取时间，搞好工作，准备打仗。这一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观念，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得以从“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中解脱出来，能够集中精力、财力、物力，从长计议军队的自身建设。会议还认为，国防建设只有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才能相应地发展。会议分析了军队的现状。邓小平把军队存在的问题概括为“肿、散、骄、奢、惰”。指出“肿”，主要是“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散”，主要表现在“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这两个方面。”“骄”，主要是“军队支左，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奢”，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有的闹享受，闹待遇”，“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有的部队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而且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有好多事是违反政策的。”“惰”，“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会议提出，军委的工作，一是“军队要整顿”；二是“要准备打仗”。整顿军队的主要任务：首先抓编制，克服“肿”的问题；第二抓装备，把定额压下来后节省的军费用于加强军工生产；第三抓战略，研究战场建设、作战、训练等问题，尤其是要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指挥水平，“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位置上”。会议还认为，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会议确定，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政治工作骨干和技术骨干，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3年内将军队总定额减少160万人。会议还决定，1975年下半年，首先配好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班子和军以上单位的

军、政一把手，然后配好师以下的领导班子。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对于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军队中的恶劣影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会议决定整顿军队，恢复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会议期间，叶剑英有针对性地有部分到会人员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要求人们要注意形势，掌握动向，坚定立场，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并传达了毛泽东对“上海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多次批评，增强了与会人员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警惕，为一年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军队的整顿与全国各条战线进行的整顿，形成1975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成绩斐然。而军队的整顿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的整顿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于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江青反革命集团极为恐慌，有时竟然赤裸裸地跳出来进行干扰和破坏。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就来个全盘否定，攻击军委扩大会议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搞“还乡团”、“举逸民”；攻击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是“打掉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为‘举逸民’开路”；攻击调整、整顿领导班子是“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聚集复辟势力”，诬称“军队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攻击整顿军队的一系列方针措施是“翻案风的产物”。在全国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被作为军队“右倾翻案”的主要标志。江青反革命集团竭力攻击会议制定的整顿军队的方针，人民解放军正待进行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又遭到无端的干扰和破坏。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但是在军队内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普遍遭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抵制。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庆，在全国、全军掀起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再次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但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那种只许把过去的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不许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否则就被认为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奇谈怪论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一种思潮，它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把我们的革命作风败坏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邓小平还指出：“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军队揭批‘四人帮’总的情况是好的，我不多说了。但是运动的发

展不平衡。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搞深搞透，进行到底，决不能捂盖子。”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整顿就要有破有立。整顿，主要是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

“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必须把派性整掉、搞臭。”

“整顿领导班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作风整顿好。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①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很快地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

1978年12月18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决定把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结束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一步批判了“两个凡是”；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初步总结了建国以后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任务。

从1975年邓小平的复出，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4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重要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代。它

^① 《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第116页、118页。

是正义与邪恶较量,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艰难曲折的年代;它是中国人民冲破旧的思想观念束缚,以新的思想迎接新挑战的年代;它是邓小平吹响时代的号角,号召全国人民投身改革洪流的年代;它是中国军事改革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整顿的思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把“解放思想”作为全党工作方针的首条提出来,不难看出,如果思想不解放,改革就无从谈起;如果思想不解放,军队建设就不会有新的突破。正如邓小平以后多次指出的那样,改革要深入进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一些思想障碍,解放思想。

军队要改革,已经成为全军官兵的共识,正变为全军官兵的具体行动。在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号召下,全军官兵敢于破除林彪、“四人帮”所搞的禁区、禁令和制造的迷信,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军队建设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第二节 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 的确立,改革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关于军事改革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科学总结新时期中国军事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的理论性认识。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建设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第二代领导和全党全军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事改革的思想,以全新的视角,崭新的思想观念,新颖的思维方式,系统地回答并解决了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他的这些思想,有丰富的内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在一定的外因和内因条件下确定的。外因条件主要包括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战争与和平的发展态势等。内因条件主要包括本国综合国力的强弱,决策人对世界基本矛盾和本国安全环境的科学分析。邓小平以伟大的政治家的

远见卓识和战略家的锐利眼光，科学地分析了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并立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实际状况，对“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发展”问题，进行了正确的战略判断，科学地确定了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

1975年，邓小平指出，打仗5年打不起来。这在当时，对长期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中国以及对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打仗真的在5年内打不起来吗？5年过去了，时间为这一科学的预见作了注释。1980年，邓小平指出：“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①那么，后来的国际背景如何呢？国际上又是怎样预测的呢？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全世界都估计到，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还有伊朗问题，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中东问题。”^②在那剑拔弩张、险象环生的年代，他镇定自若，“冷眼向洋看世界”，提出战争“可以延缓”，能争取到“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在1982年的军委座谈会上，他又明确指出：“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10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10年。现在能打仗的还是美、苏，但是这两家都不敢动，哪一家都有毁灭世界的能力，谁敢动啊？……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就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方向。”1985年，他又进一步指出，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05页

② 同上书，第204页。

至少到本世纪末大仗打不起来。在6月4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转变”战略。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我们的政策有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变化。改变了由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就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个最重要的改变,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思想。据此,军委扩大会议明确地提出了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邓小平基于对当时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的根本估计,结合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情况,坚定果断地确定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这是关系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带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决策,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也是伟大的战略谋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评述:“这次会议上不但从组织上、工作上解决了改革体制、精简整编、减少员额100万的问题,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我军建设的战略性转变。”它使我军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稳步发展的轨道,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这次会议上作出的“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随着维护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判断,是一个科学的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发展。

世界上一些沙场宿将,以笔代剑,纸上谈兵,描写着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險情景。英国的退休上将哈克特在他主笔的《第三次世界大战1985年8月》一书中,描绘了一个可怕的星期天(1985年8月4日)的凌晨,前苏联军队向西欧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德国退役少将勒泽尔编写的《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设想》一书,也设想新的世界大战将在80年代爆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其《真正的战争》中写道:“今天的形势,不祥地令人回想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情形。”美国的苏联军事问题专家道格拉斯和霍伯合著的《苏联核战争战略》一书写道:“虽然我们